



高校学术研究书系
GaoXiaoXueShuYanJiuShuXi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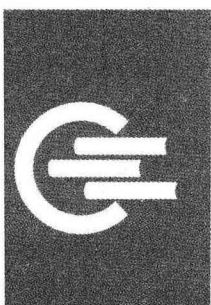
——J.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管窥

申屠云峰 曹 艳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

浙江工商大学省级重点专业（英语）建设经费资助成果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

——J.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管窥

申屠云峰 曹 艳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J. 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
管窥 / 申屠云峰, 曹艳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112 - 1680 - 9

I. ①在… II. ①申… ②曹… III. ①米勒,
J. H. (1891 ~ 1980)—解构主义—文学研究
IV. ①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729 号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J. 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论管窥

作 者: 申屠云峰 曹 艳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曹美娜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 贾文梅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1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1680 - 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解构主义三巨头，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和J. 希利斯·米勒在中国学界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重要性和地位不用多说，国内外研究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计其数。德曼被人戏称为“耶鲁学派”的黑手党教父^①，虽然过世太早，并由于年轻时撰写过反犹太人倾向的文章而受到攻击，其影响力已经衰微，但仍然是公认的美国文学批评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作为受到德里达和德曼影响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米勒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理论创新，他的作品被认为“有点像罗兰·巴特的，常常是处在批评性评论和理论之间的中间位置”^②。

要想真正研究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因为真正的研究意味着批判和超越。米勒自己就说：“真正理解德里达的方法——这将很难做到——就是要表明他搞错了柏拉图或蓬若或黑格尔，他的阅读是错误的。”^③ 所以，有学者感叹说：“要批判德里达，需要比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更高明的方法策略以及更加博大精深的思想。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能像德里达那样渊博呢？”^④ 法国哲学家让-吕克·马里翁曾说：“要超越一个真正的思想，其方法并不是驳斥它，而是重复它，甚至是从它那里借用方法以便在它之外同它一道进行思考，这样，即使失败也是一种成功。”^⑤ 其实，对于中国的西方文论研习者来说，要真正做到与他们一同思考也是极其困难的。不用说双方学

① Frank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83 - 284.

②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50.

③ J. Hillis Miller, *Theory Now and Then*,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197.

④ 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序）第6页。

⑤ 【法】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引论）第4页。

识和思想不在同一层次上，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是不易跨越的障碍。

对于像我这样的初级研究者来说，研读米勒除了以上提到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米勒自己曾用“在理论与实践之间”^①这样的标题来概括自己的文学研究特点。的确，他较少像德曼和德里达那样通过解读理论大师的理论作品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具体的文学作品解读中去。换言之，米勒对于许多西方的文学作品是非常熟悉的，常常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数家珍般地引用它们。而不幸的是，米勒所阐释的很多作品我都没有读过。哪怕是短时间的恶补，也只是临时抱佛脚，只有隔靴搔痒之感而难有真切体悟。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研读米勒的作品就成了我个人赏析西方文学名著和学习如何阅读这些名著的好机会。所以，严格地讲，这本研究米勒的小书算不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我个人学习米勒的心得体会。

要不是申请浙江省社科联的研究课题“希利斯·米勒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获得批准这个偶然的原因，这份心得体会也许永远不会以书的形式面世。但既然决定以书的形式出现，那么该如何来安排和呈现我对米勒解构理论的理解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年研读米勒给我的一个直观的体会就是，米勒在从现象学的意识批评转向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之后，其理论关注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语言本质、阅读的伦理、叙事理论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当然，这四个方面在内容上有很多重合之处，比如对于语言的思考在这四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在时间上也不全然是先后发展的过程，比如他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研究问题的思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而到了上世纪末可能更为集中些而已。不管怎样，粗略地说，这样的划分大致上是站得住脚的。^②

语言无论在哪个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都是一块重要的基石。对于米勒来说尤其是如此。米勒在本科二年级时弃理从文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学语言对于他的巨大吸引力。在年近八旬接受采访时，米勒仍然念念不忘文学语言的魅力当初

① J. Hillis Miller, *The Linguistic Moment: From Wordsworth to Stev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xiii. 这也是本书书名正题的来源。

② 显然，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米勒的解构主义阶段。当然，由于资料和时限的关系，还有很多别的题目，比如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翻译都是米勒曾经思考过的，这次没有写在本书中，有待日后补上。

对他所做选择的影响，并仍坚称“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奇特性是最让我感兴趣的。”^①事实上，在他追随乔治·普莱而从事现象学意识批评的近二十年中，他对语言也是情有独钟的。虽然意识批评的理论要求他将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中心，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意识批评专著中为语言留下了一定的位置。这就为他从意识批评向解构主义批评埋下了伏笔。在60年代末，在研读了德里达的作品之后，米勒终于认识到语言是比意识更为根本的文学基石。于是，他接受了德里达关于“延异”的思想，随后通过对普莱、艾布拉姆斯和瑞德等文学批评家的语言观的批判——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以往语言观的自我批判——米勒在70年代初转身成为了解构主义批评家，开始了他漫长的解构之旅。

虽然米勒对于语言的认识有了质的改变，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对于语言的认识还是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的。如果用“异质性”这个词来概括米勒对于语言的认识，我们认为米勒的语言观有静态语言异质观和动态语言异质观这两个阶段。简单地说，在前一个阶段，米勒所理解的语言异质性有将语法与修辞简单对立，形成二元对抗的嫌疑。这在他具体的文本解读中有所体现。而在后一个阶段，米勒注意吸收了德里达和德曼的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从而形成了动态语言异质观，成功地解决了语法与修辞二元对抗的悖论关系。正是基于对于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米勒探讨了文学的根基性问题，认为无论是相邻学科的文本还是哲学上的审美经验，抑或是所谓的物质基础都不能作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根基，而只有异质性的语言才能担当文学根基这个重任。具体说来，这个根基就是他所谓的“语言的时刻”，这也是文本生成的时刻。

根据米勒，文学批评家的语言观能区分出形而上学和非形而上学两类，据此而可以划分出“明智型”和“神秘化”两类不同的批评家。而他当然是属于后者。作为“神秘化”批评家的代表，他认为文学批评与阅读是同一个意思，而真正的批评或阅读就是一种寄生性的阅读而不是单义性的阅读。不过，我们以为他在与艾布拉姆斯交锋过程中提出的寄生性阅读仍然有陷入寄主与寄生物二元对立的嫌疑，而他所提出的“重复”则是更加有说服力的阅读模式，因为作为重复的双方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较好地体现了真正的动态语言异质性，也回答了文学批评与文本自我解构的关系。这是本书第一章中的主要内容。

① Julian Wolfreys (ed.), *The J. Hillis Miller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6

在第二章中，我们详细讨论了米勒的阅读伦理学。米勒在80年代中期提出解构主义的阅读伦理观既有其时代背景又有其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原因。时代背景就是人们似乎厌倦了对理论的争论，厌倦了总是在文本内部打圈圈，而想要走出文本，关注文本之外的现象或者说文本内部与文本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此同时，解构主义理论也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这些都要求米勒这位美国解构主义的旗手做出回应。从理论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在70年代解构主义的确是在精心打造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理论而无暇顾及或者说没有正面来阐发语言文本与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种族等所谓的文本外部的关系。一个明证是，德曼在去世前接受的采访中就坦言自己终于对语言的工作机制有了把握，现在可以较为公开地来处理意识形态等问题了。^① 所以，到了80年代正面阐释语言文本与外部力量的关系问题应该被提上解构主义理论发展的议事日程了。因此，这样的内外要求促使米勒认真思考了阅读的伦理问题。

米勒为了阐释解构主义的阅读伦理学而提出了“伦理的时刻”这个概念。他认为，阅读中的伦理的时刻，是个人面对他者的时刻，是为了呼应他者的命令而产生行动的时刻，因此就是连接文本内外的时刻。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伦理的时刻产生伦理评价和伦理选择之前必然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即认知判断先于伦理判断。在此意义上，“伦理的时刻”是“语言的时刻”内在的一部分，是语言的一种叙事形式。

米勒主要通过《阅读的伦理》和《皮格马利翁的种种版本》两本著作来建构自己的阅读伦理学。在这两本书中，米勒讨论了康德、德曼、詹姆斯、本雅明和特罗洛普等诸多理论家与小说家的作品^②。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成以下几条：（1）阅读伦理法则就是语言的法则；（2）阅读中的伦理判断是语言叙事的一种形式；（3）阅读中的伦理判断必然引发新的阅读行为；（4）阅读的伦理离不开故事，而故事则离不开拟人法。总的来说，米勒的伦理学不是对阅读伦理具体规则的阐释，而是秉承解构主义的一贯做法，阐明的是阅读伦理发生的机制。而归根结底，这个阅读伦理的发生机制其实就是语言的工作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以为米勒的阅读伦理学是成功的，是他所有解构主义理论中最具开创性的工作。

在第三章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米勒的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米勒的叙事理

① 参见 Stefano Rosso, "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 in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121.

② 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读到米勒对德里达相关理论的论述。

论与经典的叙事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无意构建成体系的叙事学。相反，他的叙事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反叙事学或非线性的叙事学，因为他坚持认为那种前后一致、体系严密、想要解开叙事奥秘的结构主义的线性叙事学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在根本上是语言的自我解构性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期待米勒教给我们任何可以套用来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工具。相反，他的叙事理论是对那些经典叙事分析中所要用到的工具和概念的解构。因此，在本章中所具体讨论的有关“线条与重复”、“叙事线条的开头、中部和尾部”、“叙事情节”、“人物与性格”和“主体间性”等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这些叙事分析中常见的基本论题，米勒从未抱以肯定的态度，而是孜孜不倦地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出发，来推翻传统叙事学对它们的定义，仿佛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堆叙事学的概念废墟。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踩在这样的废墟上，我们才能够不受人为概念的束缚，才能够认真对待文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阅读，也才能够打开文学世界无限的意义空间。

这里我们需要多说一句的就是有关米勒的解构主义叙事学与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叙事概念的角度来说，仿佛两者是互补的，因为直观地说，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了叙事概念而米勒的解构主义叙事学则解构了这些概念。一个先建构，另一个后解构，岂不是天衣无缝的互补关系？但是，这其实是在较低的层面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以为如果从研究叙事现象发生机制的角度来说，解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其实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诸概念得以提出的前提条件，或者更直接地说，前者是后者的奠基，是后者的母体。^①

在最后一章，我们主要讨论米勒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和文学研究问题的观点。在互联网的时代，“文学死了”这句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口号了。但是，文学是否真的死了？文学是怎样死的？文学还有未来吗？若有的话，它的未来又是怎样的呢？米勒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但是也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误解。因此，我们在本章中集中讨论三个问题来澄清米勒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研究的地位变化与现代大学理念衍变的关系。这是国内学界很少关注的。根据雷丁斯的看法，现代大学的理念经历了“理性”“文化”和“一流”这三个阶段。文学研究于第二个理念的阶段在英美大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现在“文化”的理念已然被“一流”的理念所取代了，文学研究的往日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米勒本人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大学使命的变化是传统文学研究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① 这只是我们的一己私见，希望诸方不吝赐教。

是在新电信时代，传统文学研究的衰落是否是技术决定的。我们以为米勒的意思是，虽然技术的进步貌似是传统文学边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由于文学本质上是理性的幽灵，它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是技术先进还是技术落后的时代，其语言形式的根本性决定了它从没有正当的时候。也就是说，文学在历史上一直都没有处在社会的中心过，现在的高新技术只不过是更加凸显了传统文学历来的边缘化地位而不是决定了这种地位。第三个问题要讨论的是米勒关于文学未来的看法。现在新的文化研究已然取代了传统文学研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米勒对文化研究抱着一贯的解构主义的冷静态度。他认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文学研究，包括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在内，都要尊重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他者，都要学会真正的阅读。所以，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取决于对他者的尊重性的阅读。他者永远不会消失，真正的阅读也永远存在，只要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文学和文学研究还会有明天。

也许，米勒想说，只要人存于世，就会有文学。然而文学研究恐怕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也许世代有人看，而评论和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有几人看呢？在这个几乎一切以有用和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年代，文学研究恐怕是比文学本身更惨淡的事业。而要写作并出版一本以文学理论研究为内容的书则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幸运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省社科联和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省级重点建设专业（英语）项目的资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为自己，也为文学和文学研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异质的语言	1
第一节 从意识批评转向解构主义	/ 1
第二节 语言的异质性	/ 11
第三节 异质语言与文学的根基	/ 34
第四节 异质语言与阅读	/ 45
第二章 阅读的伦理学	63
第一节 转向阅读伦理研究的背景 and 原因	/ 64
第二节 阅读的伦理时刻	/ 70
第三节 阅读中的伦理	/ 76
第三章 非线性的叙事学	112
第一节 线条与重复	/ 115
第二节 线条意象与互补论	/ 120
第三节 解构“情节”	/ 136
第四节 什么是“character”	/ 144
第五节 叙事中的主体间性	/ 164

第四章 全球化下的文学研究.....	172
第一节 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与文学研究	/ 173
第二节 电信时代的文学研究	/ 189
第三节 文化研究中的他者	/ 201
结 语.....	218
参考书目.....	223
后 记.....	227

第一章

异质的语言

研究任何一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必定要先了解其语言观，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毕竟，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是西方 20 世纪“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也是依据其空前精致而复杂的语言观而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所有的观点其实都可以从其语言观中演绎出来。或者说，任何有关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论题都可以配上“语言”两个字。因此，有关语言的问题可以说是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母题，从中可以派生出一切问题和答案来。J. 希利斯·米勒这位解构主义大师的理论也不例外。

实际上，从语言观入手来观照米勒的理论还有另外两层重要的意义。首先，众所周知，米勒在转向解构主义之前信奉的是现象学的意识批评。意识批评顾名思义就是对文本中作者意识的探讨，主张的是意识的原初性和首要性。而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恰恰就是要用语言来解构意识的原初性和首要性。米勒对意识中心的批判与反思和他对语言修辞本质的认识因此就是他跨入解构主义阵营的起点。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其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起点。其次，正如我们下文将要详细论述的，对于语言的特殊感觉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研究生涯。他对于语言的认识前后变化中的不变性，即始终对文学语言的奇特性的迷恋，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转向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因此，本章将首先论述语言在米勒从意识批评转向解构主义批评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后讨论米勒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具体内容，并进而阐述在这种语言观下米勒对于语言与文学的根基、语言与阅读的关系的看法。

第一节 从意识批评转向解构主义

米勒的文学批评生涯一共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首先是上世纪 50 年代在

哈佛求学时期，在大学的课堂上接受的是美国新批评的熏陶。不过，严格讲起来，这算不上是他文学批评生涯的一个阶段，因为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引起学界关注的作品。从1953年到1972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这时他追随普莱（Georges Poulet）的意识批评，放弃了新批评的那套理论，从而成为著名的意识批评家，这可以说是他文学批评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转变。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他的第二次大转变，即从追随普莱的意识批评转向德里达开创的解构主义理论，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多年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活动。

A. 且“断”且“续”的转变

米勒从由普莱培养的美国第一个本土的专注于意识的文学批评家转而成为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发言人^①，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因此，在着手对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考察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追问为什么米勒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向。是米勒本人喜欢追风潮赶时尚吗？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末，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最新款的理论时装。或者这种转变是米勒本人喜新厌旧的结果？因为米勒曾在接受访问时说：“我想，如果你不变化的话，这让人感到厌烦。”^②米勒的这种略带自嘲式的解释乍看上去似乎并不值得重视。但是，在这种貌似调侃的玩笑话背后的确隐藏着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我们知道，米勒在本科时，一开始选择的并不是文学专业而是物理学。在1990年写的一篇序言中他说：

“尽管表面上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致力于细读是‘新批评的遗产（an inheritance）’。它来自于对文学语言中局部的奇异性（local strangeness）的一种首先的和持续性的迷恋。在我听说新批评之前，更不要说听说弗洛伊德、拉

① 米勒追随普莱的现象学批评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普莱成为同事后。他在普莱的指导下写了几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是普莱的意识批评在美国本土的第一传人。此后，米勒作为著名的“耶鲁学派”的成员之一，始终通过自己卓越的文学批评才能在宣传和捍卫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所以可以称为是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言人。

② Martin Heusser & Harold Schweizer, “The Authority of Reading: An Interview with J. Hillis Miller”. In J. Hillis Miller, *Hawthorne and History*, Oxford: Basile Blackwell, 1991, p. 155. 转引自 Manuel Asensi, *J. Hillis Miller; or Boustrophedonic 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康、艾布拉姆 (Abraham) 和托罗克 (Torok) 之前, 这种迷恋就深深吸引着我。这是我大约在 1946 年从物理学转向文学的动机, 这种迷恋自那时起一直很强烈。我当时和现在一直确信, 只有通过语言中的局部奇怪之处的注意, 并跟随着它们, 对它们的提问能引领你到哪儿你就跟到哪, 文学才能得到最好的使用。”^①

这段话不仅说出了米勒从自然学科转向文学的原因, 而且道明了米勒研究文学的一个基本动机, 即对文学语言的特异性的迷恋。在 1992 年, 当谈到放弃意识批评而采用解构主义理论的原因时, 他又说:

“我在《小说与重复》和阿里阿德涅项目 (Ariadne project) 中转向文学的修辞不仅仅是用一种欧陆思想置换另一种。这也是重新回到文学中对局部的语言怪异性的一种天生的持久的迷恋。这是我早听说雅克·德里达, 肯尼斯·伯克 (Kenneth Burke) 之前转向文学研究的最初动机。这种迷恋成了贯穿我的所有作品的主要常项 (constant)。”^②

其实这样类似的话他早在 1982 年, 在奠定他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地位的《小说与重复》中就说过: “文学的具体性和奇异性, 每部作品让读者感到奇特的能力, 如果他能准备好来感受奇怪的话, 意味着总是超出了批评家用来涵盖它的任何公式或理论。”^③ 如果说米勒的这番夫子自道是在他早已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解构主义者时说的而不足为凭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当他还是一名意识批评家时所说的话。

米勒在 1969 年为他最后一次运用意识批评方法写成的《托马斯·哈代: 距离与欲望》所做的序言的开头这样明确地说道:

“文学批评是关于语言的语言, 或者, 换言之, 是在批评家的头脑中重新创造由镌刻在被研究的文本中、为那儿的文字所生产的意识。这样说就是对在批评行动中所发生的东西的某种习惯性隐喻的质疑。其中就有那些视觉性隐喻, 它们将批评家当作针对文本的观众, 认为他们探究文学文本就像科学家有时候被认为探究他所探查的事物那样, 客观而毫无感情。”^④

① J. Hillis Miller, *Tropes, Parables, Performatives: Essays on Twentieth - Century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vii - viii.

② J. Hillis Miller, *Ariadne's Thread: Story L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v.

③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 5.

④ J. Hillis Miller, *Thomas Hardy: Distance and Desi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vii.

这段话尽管是在意识批评理论指导下说出来的，但是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米勒提出文学批评是关于语言的语言。这与他所宣称的一直关注语言本身是一致的。这说明，无论是在意识批评阶段还是在解构主义阶段，他对语言的关注一直没变，虽然对于语言地位的认识有前后的变化。其次，他反对将文学批评与文本的关系比作科学家与科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在科学家那里，语言应该是透明的，语言能够直接而客观地指涉世界。那么，米勒对这种比喻的反对其实就隐含了他对于语言的看法，即语言不是那样客观透明的科学工具。虽然他在这里没有直接说语言本身就有那种他在解构主义阶段所说的不透明的物质性，但是，对语言透明性的否认与对语言不透明的物质性的肯定显然只有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米勒始终保持着对语言的或明（在其解构主义阶段）或暗（在其意识批评阶段）关注。事实上，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米勒虽然追随普莱的意识批评，但是他并不是普莱所愿意看到的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批评家^①，因为普莱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意识的认同说（identification）在米勒那里只是被当作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操作。这表现在从一开始，即米勒在普莱指导下写成的第一本意识批评专著《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中就表现出了他对语言的不透明性的关注：

“诗歌或小说的确是作者精神的内在结构相一致而重新塑造的世界，但与此同时这个精神是通过词语而从所分享的固态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了形式与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作品的词语自身就是首要的材料，一个批评家无须超出自足的现实。”^②

如果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是一个自足的世界的话，那么说明这个语言世界并不是批评家所能轻易穿透的，即对于批评家来说不是完全透明的，而这也是米勒在解构主义阶段的一个理论起点。所以，我们的论述表明，米勒从意识批评向解构主义批评的转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或者说对语言的不透明性、奇异性的关注应该是贯穿米勒文学批评活动的一条红线，虽然这条红线有时候（在意识批评阶段）是完全隐藏在其批评活动内部，有时候（在解构主义阶段）则完全是作为一种原则起着明显的引导作用。

语言构成文本，对文本的态度也是任何文学理论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

① 参见 Donald Pease, “J. Hillis Miller, The Other Victorian at Yale”, in *The Yale Critics: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ed. Jonathan Arac, Wlad Godzich, and Terrence Marti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77.

② J. 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x.

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米勒的意识批评阶段与解构主义阶段的某种隐匿的连续性。在1969年的《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的序言中,作为意识批评家的米勒认为批评家要理解一部作品,必须要进入文本的内部去。但是文本是怎样的呢?该如何进入呢?米勒的回答是要将文本像哈代那样看作是一块织好的布匹。他说:

“一个文学文本就是词语的肌理结构(texture),它的线条和细线向外进入已经事先存在的语言的结构中去。批评家将他所编织的添加到文本的佩内罗蒲的布匹(Penelope's web)之上,或者解开它,这样它的结构性的线条便暴露出来了,或者重新编织它,或者追踪文本中的一条线来揭示它所镌刻的图案,或者将整匹布剪成一个或另一个形状。在某种意义上批评家在理解或阐释文本的活动中必然对文本施以暴力。不存在清白无辜的阅读,没有什么阅读是让作品完全保持原样的。”^①

在这段话中,米勒将文本比作由线条组构的布匹,这也是他在解构主义阶段一直使用的比喻意象。比如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就使用了佩内罗蒲的意象^②:“如果佩内罗蒲在夜晚将她白天所编制的拆开,本雅明说,普鲁斯特的写作就是它的颠倒。它晚上编织而白天解开。”^③在同一本书中,米勒又使用了这同一个意象来说明萨克雷小说中的反讽手法,认为它“就是佩内罗蒲的遗忘之网,它不是根据相同性而是根据本雅明所说的‘不透明的相似性’而起作用的。”^④当然,米勒在两个不同的阶段由于不同的指导思想,对文本作为线条织就的布匹这个意象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从我们上面的引文不难看出,米勒在意识批评阶段认为,作为布匹的文本是依靠批评家暴力性的介入才能被拆解开来,显示出其纹理,或被重新编织。而在解构主义阶段,米勒这样说:

“请不要在此产生误解。我刚刚描述的情形不是说对于吉姆的行动的一套

① J. Hillis Miller, *Thomas Hardy: Distance and Desi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viii.

② 在古希腊神话中,佩内罗蒲在丈夫尤利西斯被征召去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岁月里,被许多求婚者强行追求。为了拖延时间,她借口说自己正在织她公公葬礼上用的遮蓬,等织完后再在求婚者中选定自己的丈夫。但实际上,她白天不停地织,到了晚上就把白天织的都拆了。

③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p. 6-7.

④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Oxford: Basile Blackwell, 1982, p. 115. 米勒在以后的著作中多次地使用了这个线条意象,这成为他所使用的经典的解构主义意象。

可能性的解释是无限的，在无限的多重性和模糊性的意义上是不可确定的。各种意义不是由读者的主观阐释所自由设置的，而是由文本控制的。”^①

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即它的自我拆解不是由于读者或批评家外部介入的结果。文本的线条自身在构成文本时就已经自我拆解了。不过，这种对文本性质认识的前后差异却是很奇妙地建立在将文本比作佩内罗蒲的布匹这个共同的比喻之上的。换言之，这个共同点就是对文本的可拆解性的一致认识，差异之处在于对于文本拆解性的原因的解釋不同。

无论持怎样的文学理论观，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要面对这样一些问题：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怎样的？作者与读者或评论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读者或评论者与文本的关系是怎样的？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是怎样的？研究文学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围绕这些关系在做文章。米勒在1965年的一段话中比较概括性地总结了他作为意识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式，文学批评就是对此形式的各种样态的分析。虽然文学是由词语组成的，但是这些词语体现思想状态，并使他人可以获得这些思想状态。对文学的理解就是加布里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所说的‘主体间性’的过程。批评所要求的首要的就是参与的才能（the gift of participation），将自己置入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能力，就是济慈说的否定性能力（negative ability）。如果文学是一种意识的形式，那么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将自己与在词语中所表达的主体性相认同，从内部来重新经验那种生命，然后在自己的批评中重新构建它。”^②

在米勒这段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普莱意识批评的文学理论观的话语中，有两个短语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参与的才能”，另一个是“否定性能力”。“参与”一词是对上面我们所提的各种关系的一个关键词式的回答，^③而“否定性

①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Seven English Novels*, Oxford: Basile Blackwell, 1982, p. 40.

② 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Five Nineteenth - century Writ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5, p. ix.

③ 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参与”（participation）这个词与“认同”（identification）的差异。前者具有动态意味，而后者则更多的是静态含义。“参与”一般用来与“活动”搭配，而活动一般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认同”则是对两个固定的主体间的关系的描述。因为如果认同的主体和被认同的主体假如都是流动的状态，则是很难实现这种认同关系的。所以，这种细微的差异也说明了米勒当时的意识批评与普莱的理论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就为米勒转向解构主义做了准备。我们接下去对“否定性能力”的论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